外语学科与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查明建*

摘　要：中国的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两者相生相依，互动共进。就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现状来说，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有多方面的意义：从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动态的及时了解，到国际比较文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借鉴，从对国外比较文学发展理路的探寻，到拓展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学术空间，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都需要外语学科多方面的支持。同时，外语学科也需要借鉴和运用比较文学的人文理念和方法，对传统的外语专业教育模式进行人文化改革，转变传统的外语专业教育理念，实行外语教育的转型发展，提升外语专业教育的专业性和人文性，增强外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关键词：外语学科；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外语专业教育；人文教育

Title: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developing interdependently and interactively, are intimately related in China. Considering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it could be stated that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provides multidimensional support for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More specifically, it provides facilities not only to keep in step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t also to introduce and translate its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approach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broad, but also to expand the academic scop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t only to deepen the study of 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ut also to expedite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

* **作者简介**：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电子邮箱**：zhamingjian163@163.com。

Conversely,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lso needs to learn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dopt its methodology and humanistic ideal, for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pedagogical mode and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and humanistic attribute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 students.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 major education; humanistic education

1921 年，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从英语系中独立设置了“西洋文学系”，吴宓先生开设“中西诗之比较”、“世界文学”等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虽然西洋文学系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意义却很深远，它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初步形成，并作为独立的学科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同时，也说明中国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的亲缘关系。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比较文学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真正有了比较稳定的学科建制。虽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的 50 多年间我国没有独立的比较文学学科，但也不乏高水平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胡适、吴宓、陈寅恪、郑振铎、朱光潜、梁宗岱、范存忠、陈受颐、方重、钱锺书、季羡林、戈宝权、施蛰存、贾植芳、杨周翰、叶水夫、王佐良、李赋宁、乐黛云等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奠定了基础。以上学者中，大多是外语学科出身或有海外留学背景，说明中国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的亲缘关系一直赓续不断。

但是今天，为什么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的关系却成了一个需要讨论和强调的问题？这要追溯到 1997 年的学科目录调整。调整后的学科目录，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划归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划归中国语言文学后，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比较文学项目的申请和成果归属为中国文学，这给外语学科的比较文学学者造成了不少困扰。对中国比较文学而言，缺少了外语学科学者的参与，外语优势得不到发挥，大大减弱了国际比较文学领域中国学者的声音，也限制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成果在国际上的交流和传播。

从学理和学科内涵上说，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既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又属于中国语言文学。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曾提出，大学文科不必分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而只分“文学系”和“语言系”。这体现了中外文学整体观的思想。由此我们联想到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文学家哈里·列文(Harry Levin)的名言：“无比较，何以文学。”(What is literature if not comparative?)——世界文学在相互联系、比较中，构

成了一个相互观照、相互阐释的整体。

外语学科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相得益彰。下面我仅从比较文学和外语学科的现状,论述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和相互融合的必要性。

1 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

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梳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考察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多元化,增强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性自觉",将中国比较文学融入国际比较文学,更新中国的比较文学观念,以及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都需要有外语学科学者的参与。

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如果不能及时与国际比较文学交流,及时而充分地借鉴新的学术成果,就很容易故步自封、闭门造车。

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员,其发展,离不开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动态和发展趋势的了解和把握,离不开对国际比较文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启迪。

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处于复兴阶段,非常关注国外比较文学的发展,曾翻译出版了多种比较文学论著,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大塚幸男的《比较文学原理》、弗朗西斯·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布吕奈尔的《什么是比较文学》等,以及《比较文学译文集》、《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等译文集。这些译著和译文集,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广泛引用,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再加上比较文学划归为中国语言文学后,此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外语专业学者大多退出了比较文学领域,类似这样的译著或译文集就逐渐稀少了。

由于对国际比较文学近年来的实际发展状况了解不多,更难以对其发展走向的深层原因有深入研究,因此,有的比较文学学者往往依据零星的二手资料就下断语,如"欧美的比较文学,已从比较文学走向了比较文化","欧美的比较文学,转向了文化研究"。未研读斯皮瓦克著作《一门学科之死》(*The Death of a Discipline*),仅凭其书名,就断言:"欧美比较文学已经死亡,而中国比较文学一派兴旺。"实际上,斯皮瓦克并非真的是说比较文学学科已死,而是说北半球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传统比较文学范式已经过时,一种跨越了边界,聚焦于可比性,关注语言和习语,诉诸遥远的想象,突出作品的细读,结合区域研究,连接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同时属于南半球的新型比较文学已经诞生。

我们常常听到的"欧美比较文学危机论",也是由于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理

路缺乏深入了解所致。如果我们本着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的学术精神，就会认识到，从克罗齐到韦勒克，从雷马克到斯皮瓦克，从理论热到世界文学热，所谓“危机”，都隐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是对这门学科的学科意义、学科本体、人文价值的不断思考和追求。而这种问题意识，正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先锋性，及其可贵的学术精神和人文担当。正如苏源熙(Haun Saussy)所说：比较文学学者的思维、著述和教学方式像福音一样传遍人文学科领域，成为人文学科领域里的“首席小提琴”，为整个人文学科“乐队”定调。(Saussy，2006：34)

比较文学在不同的国家，因其本土资源、文化语境、学术背景和开展比较文学的目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范式和发展道路，形成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多元化现象。比较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既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时代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也是比较文学在各自民族文学中发挥作用的必需。

比较文学的多元化，从纵向上看，是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扩大疆界；从横向上看，是从本土的文学实际出发，发挥自身的优势，带动本国的文学，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我们可以根据比较文学在学科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发展，更加充分地探讨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可能的发展空间。

就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我们可以从国际比较文学的多元化系统中，总结自己的特点，明确优长，反思不足。又可以从比较文学多元化的发展中，分析比较文学对不同国家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所具有的意义，从而坚定比较文学的人文价值，将其深度地融入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之中。以上这些课题，都有赖于外语学科精通相关语种的学者参与方能完成。

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还体现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领域。目前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很多还仅是从中国文学这一方单向度地进行，缺乏对相应外国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例如王尔德在中国、劳伦斯在中国、萨特在中国、卡夫卡在中国之类的研究，对于这些研究，还需要对这些作家在其本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评价进行共时性的考察，才能对中国如何译介、阐释、接受这些作家作品，作出富有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的阐释，以彰显中国对这些作家接受的特点，继而分析和探讨其深层原因。

“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外人文交流”，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界比较热门的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简单、狭隘地理解为就是翻译问题；“中外人文交流”，也不能停留在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和人员交往层面。“中外人文交流”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将相关问题从理论上探讨清楚，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否则就会以己度人，匆忙行事而事倍功半。外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哪些比较成功的事例和模式？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具有普世性和独特价值的文化？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用对方能理解和可接受的话语来传播中

国文化？怎样的传播方式才能增强外国人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和亲和力？等等，都是中外人文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要探讨、研究清楚的理论问题。探讨外国文化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分析当代外国文化的发展现状和国民文化心理，总结中外人文交流的成功经验，寻找恰当合适的沟通话语，需要外语学科学者发挥学术专长，贡献相关的研究成果。

2 比较文学之于外语学科的意义

社会普遍反映，外语学科学生知识面狭窄，人文修养不足，思辨能力差，在人才市场上竞争力弱，事业发展空间狭窄，缺乏发展后劲。外语学科中，英语专业面临的危机尤为严重。随着英语教育的低龄化、普及化和社会化，大学入学英语水平普遍提高，英语成绩好的学生不愿再到英语专业学习，导致优质生源严重流失。优质生源减少、就业竞争力弱，只是问题的表征，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学科意识模糊，专业意识淡薄，人才培养目标短视。

从1861年中国第一所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到现在，中国的外语教育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一个半世纪的外语教育，以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成效来看，成就最大的，当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和40年代的西南联大。其成功的经验，就在坚守外语教育的人文学科理念，注重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而不是将外语专业狭隘地理解为就是学习外语的专业，将外语教育简化为语言技能训练。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外语人才培养的成功，吴宓先生功不可没。吴宓先生的比较文学和人文教育思想，奠定了19世纪20—40年代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培养“博雅之士”的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

1926年，时任清华西洋文学系(后改称外文系)代理系主任的吴宓先生“参考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李赋宁，2005：105)，制定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课程总则》，开宗明义地点明西洋文学系的目标，是培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博雅之士”，所设置课程之目的，是“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黄延复，1992：35-36)。

正是在这种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氛围中，才培养出了钱锺书、季羡林、李健吾、陈铨、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等一批学贯中西的杰出外语专家和比较文学家。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以及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外语专

业课程体系，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是外语学科转型发展、实施外语教育人文化改革的重要借鉴。

吴宓先生的努力，“使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走上了全面、系统、严格、科学的道路”（李赋宁，1992：7）。吴宓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外语教育理念，得益于其在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学术训练。不仅比较文学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有助于我国外语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外语专业学生中外人文修养欠缺的现状，在外语院系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也显得非常有必要。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扩大了学生的中外文学视野，使其感受文学的魅力，提升文学修养和人文素养，培养人文情怀，促使外语专业学生自觉地将自己所学语种的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通过文学比较，加深对中外文化特质的认识。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就是健全人文知识结构，培养人文精神，提升人文修养和审美感悟能力的过程。通过学习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培养发散性思维和提高思辨能力。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待不同文学、文化间的异同，思考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对话问题，培养学生“文化自觉”与跨文化比较的意识。这些都是比较文学提高外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所在。

钱锺书先生指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钱锺书，1994：133）。人文学科的这种特点，在比较文学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比较文学的发散型思维和善于在事物间寻找到联系点的特点，还可借鉴、运用于外语专业其他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中外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方式、修辞方式、表达方式等进行比较，发现共性和差异，扩大学生的人文视野和学术视野，增强跨文化比较意识，激发研究兴趣。

总之，外语学科与比较文学相依共生而互动共进。从国外比较文学发展现状的介绍，到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借鉴；从对国外比较文学发展理路的探寻，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化，都需要外语学科多方面的支撑。而外语学科也需要运用比较文学的思想和方法，以增强外语专业教学中的人文内涵，提升外语专业的人文品质。尤其是当下我国英语专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发展时期，比较文学与英语专业的结合，将促进英语专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使其真正成为一门人文学科专业，而不仅仅是学英语的专业，从而发挥英语专业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独特作用，体现英语专业的专业意义和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Saussy, H. (Ed.). 200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 李赋宁，2005. 吴宓先生与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A]. 载刘家全等（编）. 第三届吴宓学术讨

论会论文选集[C].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3] 黄延复,1992.吴宓先生与清华[A].载李赋宁等(编).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4] 李赋宁,1992.纪念近代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诗人、学者、教育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先驱吴宓先生[A].载李赋宁等(编).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5] 钱锺书,1994.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